



# 新加坡华人华侨谱牒的叙事学研究

■ 邢永川 林炫圻



本文微信网页版

**摘要:**从叙事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新加坡华人华侨谱牒展开深入探究,探寻其在文化认同塑造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联系历史叙事学与文化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利用文献梳理以及个案研究等方法,全面剖析谱牒的叙事结构,表达方式及流传机制。通过研究得知,新加坡华人谱牒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多种特性,在形态上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在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本地化趋向,这种谱牒既看重“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又重视祖先崇拜的文化习俗,而且在跨国语境当中,它一直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本质价值。谱牒是家族历史的承载者,既是记录工具,又是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技术更新与全球融合的环境里,谱牒的叙述手段与流传途径大概会持续改变,不过,作为文化传承主要媒介的地位大概不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侨;谱牒;叙事学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5.11.004

谱牒作为记录家族世系、传承历史记忆的核心文本,在华人社会长期承担着建构身份、维系认同的文化功能。叙事学聚焦叙述行为与文本结构,考察故事如何被讲述、意义如何被生成,以及叙述者与受众间的互动机制。将叙事学引入谱牒研究,可揭示其如何通过时间序列与情节编排,将个体生命史整合为家族集体叙事,进而塑造“我们”的共同体意识。

新加坡华人身处多元文化交汇的移民社会,其谱牒实践既承袭中华传统,又回应在地语境,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形态与文化表达。<sup>[1][2]</sup>为确保样本兼具典型性与多样性,本文案例选取紧扣新加坡华人社会核心构成:方言体系覆盖闽南、潮汕、海南等主要社群,移民脉络纵贯19世纪末初代至21世纪新生代,社会分层包含商业精英、普通从业者及社区服务者,具体纳入颜氏、王氏、沈氏等宗亲会谱牒,以多维度筛选全面反映其整体面貌。

本文以叙事学为理论支点,综合历史叙事学与文化叙事学视角,通过文本细读与个案分析,探讨以下问题:新加坡华人谱牒呈现何种叙事特征?这些特征如何参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与传播?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下,谱牒叙事如何调适以延续其文化生命力?

## 一、文献综述

### (一) 叙事学: 从结构到意识形态

经典叙事学将叙事视为“以时间序列整合事件的话语模式”(彭刚,2006),强调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

的双重结构,<sup>[3]</sup>为谱牒的线性世系与修辞策略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海登·怀特(1973)进一步指出,历史文本通过“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三级编码,将编年事件升华为价值叙事;<sup>[4]</sup>这一洞见可用来检视谱牒如何把个人生卒、迁徙与国家历史并置,从而赋予家族经验以宏大意义。约恩·吕森则以“理性逻辑”与“诗性逻辑”区分不同文化的叙事认知方式,<sup>[5]</sup>提示我们在跨文化语境中比较华人谱牒与西方家谱的叙事差异时,需关注其背后的认知范式而非仅停留于情节表层。

### (二) 历史叙事学: 家族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协商

历史叙事学关注“谁的历史”“如何被讲述”以及“为何如此讲述”。陈涵平(2003)对《扶桑》的分析表明,文学叙事通过虚构细节填补档案空白,从而挑战官方历史的单一权威;<sup>[6]</sup>谱牒同样以“补缺”方式,在官方移民史之外建构家族微观史,形成与国家叙事的互补或张力。杨庆祥(2013)指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使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家族史成为“情感史”的试验场;<sup>[7]</sup>华人谱牒亦通过口述、照片、题词等多模态材料,将情感维度注入世系图式,强化代际认同。杨丁友(2008)揭示《史记》“文学性历史”的修辞特征(如褒贬笔法、互文典故),<sup>[8]</sup>提示谱牒中的“像赞”“族规”亦可视为微型史诗,其修辞选择同样服务于道德评价与身份塑造。

### (三) 文化叙事学: 物质、制度与精神的三重维度

文化叙事学将文本放回文化语境,追问叙事如何被“文

化语法”所塑造。张开焱(1994)提出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框架,<sup>[9]</sup>为解读新加坡华人谱牒提供了宏观视角。

1.物质层: 谱牒的印刷装帧、祠堂空间、数字化界面, 决定了叙事如何被“观看”与“触碰”;

2.制度层: 宗亲会章程、修谱委员会组织, 规约了“谁有资格被书写、谁掌握诠释权”;

3.精神层: 儒家孝悌、祖先崇拜、家国伦理, 构成了叙事的价值坐标。

李炜(2010)对大众文化叙事的研究指出, 当代文本常通过“类型化角色”与“仪式化情节”降低理解门槛;<sup>[10]</sup>新加坡部分数字化谱牒亦采用“成功范式”(创业—回馈—荫及子孙)的模板化叙事, 以适配快速阅读习惯。高鸿(2005)的跨文化研究则提醒我们, 当华人谱牒进入英语语境时, 需在“孝”与“Citizenship”、“祖先”与“Heritage”之间进行语义协商, 其翻译策略本身即一种文化叙事。<sup>[11]</sup>

#### (四) 叙事传播: 从家族内部到全球网络

叙事传播研究聚焦“故事如何流动并产生认同”。臧国仁、蔡琰(2019)提出“故事—人文—媒介”三位一体模型: 故事提供意义框架, 人文语境决定解码方式, 媒介技术影响扩散半径。<sup>[12]</sup>该模型可用于解释新加坡谱牒的两大传播转向:

1.数字化: 在线数据库与社交媒体使家族叙事突破地理边界, 全球宗亲得以实时增补、评论与再创作, 形成“分布式共笔”的叙事生产机制;

2.本土化: 当谱牒叙事被纳入新加坡国民教育或地方志展览时, 其“华人经验”被重新语境化为“国家多元种族经验”的一部分, 从而与主流叙事形成互文。

综上所述, 既有研究从叙事结构、历史记忆、文化语境与传播机制四个维度, 为本文提供了多元理论工具, 但仍留下以下缺口: 缺乏针对新加坡华人谱牒的系统性叙事分析, 尤其缺少对“家国一体”与“祖先崇拜”如何以直义/转义方式并置的微观考察; 对数字化语境下谱牒叙事的“媒介化”过程(如数据库分类、界面隐喻、用户生成内容)关注不足; 较少探讨本土化语境中, 家族叙事如何与“新加坡故事”进行话语协商。本文将结合叙事学与传播学视角, 通过典型案例填补上述空白。

## 二、新加坡华人谱牒的叙事特征

叙事特征, 即叙事形式, 也就是“如何讲述”家族历史的策略。从语言层面的多语并置, 媒介层面的数字重构, 再到内容呈现层面的本土嵌入。作用分别为解决跨文化、跨代际的阅读障碍, 革新记忆的存储与交互方式, 以及通过视角调适实现与在地语境的适配。这些策略共同构成谱牒叙事的载体框架。目的是优化故事的传递路径, 暂不涉及文化价值本身的阐释。

#### (一) 多语并置: 语言多样性的跨文化策略

新加坡的语言生态由华语、英语、马来语及泰米尔语共同构成。华人谱牒在此语境中呈现出“双语对照—语码杂糅—语境切换”的三级策略, 其核心功能是让不同世系、不同语言能力的族人都能进入叙事, 从而维系跨代、跨地域的

认同。

1.双语对照。典型文本如《新加坡颜氏公会30周年纪念刊》在族规、世系表、人物传记等关键节点提供中英对照。其排版以左页中文、右页英文的镜像结构呈现, 既保留中文的典籍感, 又为英语教育背景的第二代提供“零障碍”阅读路径。这种“1:1平行语篇”策略, 将语言差异转化为文化资本, 向外界展示“华人传统—现代公民”双重身份。

2.语码杂糅。在口述史与访谈栏目中, 受访者常用“华语主干+英语术语”的混合语码, 如“祖先tablet必须放在main hall”。英语插入词多为制度性概念(Citizenship, HDB flat), 中文则保留情感与仪式词汇(慎终追远、血浓于水), 形成“情感—制度”语义分工, 既贴近日常语言习惯, 又凸显文化核心价值的不可译性。

3.语境切换。面向马来西亚或欧美宗亲的电子通讯, 谱牒文本会主动后设注释, 例如将“落叶归根”译为“Roots-seeking journey”, 并辅以超链接解释“根”在华人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这种“语境化翻译”使传统概念在新文化场域获得再生, 避免了文化折扣。

#### (二) 数字重构: 媒介形态的融合与再生产

新加坡族谱学会与各大宗亲会自2010年起推动“数字化谱牒工程”, 其转型呈现三大特征: 数据库化、可视化、社交化。

1.数据库化。传统世系表被拆分为“Person–Event–Place”三元组, 录入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实现跨谱检索。例如输入“王友海”即可关联其捐赠的太原山地块、对应的新加坡地籍号及现存土地契约扫描件。数据颗粒度的细化, 使谱牒从“叙事文本”转变为“可计算的记忆基础设施”。

2.可视化。时间轴(Timeline)与迁徙地图(Migration Map)成为标准组件。家族迁徙路径以动态热力图方式叠加在新加坡开埠200年的历史图层上, 用户可通过滑块实时查看“1920–1940”与“1980–2000”两波移民潮对家族人口分布的影响。这种“时空压缩”叙事, 把线性阅读转化为交互式体验。

3.社交化。在线平台嵌入“家族故事”模块, 族人可上传照片、短视频或语音留言, 经管理员审核后自动关联到相应世系节点。一条关于“曾祖父在牛车水经营药材铺”的30秒短视频, 可同时标记地理位置、店铺匾额上的汉字书法及背景音乐“南音”, 形成多模态叙事。平台算法依据点赞、分享次数将热门故事推送至首页, 使“家族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的可见性竞争。<sup>[13]</sup>

#### (三) 本土嵌入: 内容本土化的叙事协商

“本土化”并非单向适应, 而是通过选择性凸显、价值并置与叙事框架置换, 将家族历史编织进新加坡国家叙事, 形成“全球华人经验—在地公民责任”的双重话语。

1.选择性凸显。《王氏开宗百世录》在“先贤传”部分刻意增加“公共事务贡献”子栏目, 以“商业成就—社会回馈—国家荣誉”三段式结构叙述: 先概述先贤在橡胶业、银行业之成功, 再列举其捐助华中、南洋大学及社区基金的义举,



最后附上政府颁发之PBM(公共服务星章)。这种叙事顺序将经济资本转译为象征资本,使家族荣耀与国家发展同构。

2.价值并置。谱牒中常见“祖籍地—新加坡”双重地景并置。例如沈氏族谱在同一页左侧放置“河南固始县古地图”,右侧放置“新加坡沈氏大宗祠今貌”,配文强调“虽远离中原,仍以礼乐传家”。通过视觉对位,把“离散”转化为“双重扎根”,消解了“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之间的张力。

3.叙事框架置换。在国庆特刊中,家族纪念日被有意识地改写成国家时间。如“王氏先贤建祠一百周年”庆典被命名为“三庆大典”,与“新加坡开埠150周年”“建国四周年”并列。献词中“筚路蓝缕,共建狮城”取代了传统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祖先的拓荒精神转译为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完成从“宗族史”到“国族史”的框架置换。

多语并置、数字重构与本土嵌入构成了新加坡华人谱牒叙事的当代特征:语言层面,跨语码策略扩大了叙事受众,同时维护了文化核心的不可译性;媒介层面,数据库与可视化技术重塑了阅读方式,使家族记忆成为可交互的公共知识;内容层面,本土化不是替代而是协商,通过凸显国家贡献与双重地景,谱牒既保持了华人文化连续性,又完成了在地身份的重构。这三重特征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新加坡华人谱牒正从“家族档案”转型为“文化接口”,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之间,持续生产新的认同叙事。

### 三、新加坡华人谱牒叙事中的中华文化观念

叙事中的中华文化观念,聚焦新加坡华人谱牒的叙事内容,即“讲述什么”。新加坡华人谱牒虽生成于移民社会,却持续充当中华文化的“压缩文件”。其中,“家国一体”与“祖先崇拜”两条叙事主线,通过“直义—转义”双重修辞机制,既维系传统价值,又回应在地政治与文化语境。其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借由叙事形式得以具象化。叙事形式是手段,文化观念是其承载的本质;二者既分明又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家族历史的完整表达。

#### (一)家国一体: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1.直义:显性话语的三种套式。谱牒通过“题词—族规—献词”三级文本,直接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发展并置<sup>[14]</sup>: (1)国家感恩式:如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开篇即言“三代人励精图治……令新加坡从荒渔村跻身繁华都会”,把家族奋斗史嵌入国家成功叙事; (2)效忠呼吁式:颜坚生献词“星洲者,国中之国也……我颜氏族众,迭立汗马奇功”,以第三人称强化客观性,号召族人继续为新加坡贡献; (3)未雨绸缪式:同一族谱提醒“后世子孙走向世界,仍不忘根在狮城”,把国家认同转译为“心理—思想”双重准备,使“离散”成为预设路径而非被动结果。

2.转义:隐喻与并置的隐性编码。当显性宣言可能触犯在地政治敏感时,转义策略以隐喻、典故、对位完成价值传递<sup>[15][16]</sup>: (1)隐喻:白凤毛将“追根寻祖”与“多民族国家”类比,先以“木本水源”对冲“效忠”疑虑,再以“各民族共荣”为追祖行为合法化; (2)典故:王氏三庆献词“百五开基,九鼎迁还星岛”借周室迁鼎之典,把新加坡建国写成“天命转

移”,既暗示正统,又规避当代政治评述; (3)对位:白氏族诗“漫天烽火接南楼”表面写抗战,实则以南北战场隐喻全球华人的跨域抗争,将家族哀伤升华为“家国同难”的共同体情感。

#### (二)祖先崇拜:神圣叙事与在地英雄并置

新加坡华人谱牒中的祖先崇拜呈现“双层结构”:上层是对炎黄、开姓始祖的神圣叙事,下层是对在地先贤的功绩叙事。二者通过“像赞—传记—仪式”三种体例交织,既维系文化根脉,又塑造现代典范。

##### 1.民族祖先:神话化与历史化的双向缩减

(1)神话化:《许氏宗谱》炎帝像赞以“教民稼穡,尝试百草”浓缩神农传说,用四句赞词完成从神话到道德符号的提炼; (2)历史化:王氏《黄帝战蚩尤大舞曲》将神话改写为“正义—邪恶”二元剧,黄帝以“诸侯同心”获胜,蚩尤则“技穷就擒”,在“神武”与“失道”的对比中,为“华人正统”提供叙事原型。

##### 2.家族祖先:开基功业与在地贡献的双重颂扬

(1)开基叙事:《王氏开宗百世录》五篇《祖德颂》均以“太原开族宗功远,开闽第一祖泽长”收束,将地理迁徙(太原→闽)与道德秩序(孝、义、礼)并置,形成可复制的叙事模板。(2)在地叙事:星马先贤传记采用“事业有成—社会服务—直系亲属”三段式,如王友海“购山献族—创办商行—夫人子女”一例,把经济成功转译为“公共馈赠”,使个人资本升华为家族—族群象征资本。(3)性别编码:沈氏武德侯夫人像赞以“相夫贤内助,端庄称贤母”收笔,延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框架,却在“神游至玉京”一句中赋予女性宗教超越性,暗示贤德可通向神圣,完成性别角色的隐性补偿。(4)视觉—仪式叙事:图像与程序的情感放大。祖先崇拜不仅依赖文字,更通过“像赞+玉照+祭祀”形成跨媒介叙事:①像赞:以四字或八字偶句浓缩祖先一生功绩;②玉照:现代先贤配彩色肖像,与传统木刻祖先像并置,制造“古今同堂”的时空压缩;③祭祀:周年庆典将“读祝—献花—鞠躬”标准化,把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仪式,实现“记忆的身体化”。

家国一体与祖先崇拜在谱牒中并非静态符号,而是通过“显性宣言—隐性编码”“神圣叙事—在地英雄”双重机制不断更新:家国叙事完成了从“效忠祖籍国”到“建设新加坡”的位移;祖先叙事实现了从“神话原型”到“现代典范”的转接。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压缩—解压”式的文化技术:在有限文本内高密度存储中华价值,又能通过仪式重演、数字交互、阅读等多元方式,实现家族记忆的意义重构与文化认同的持续再生产。

#### 四、结语

以叙事学为经,以传播学为纬,系统考察新加坡华人谱牒如何在移民社会与数字时代双重语境中,既延续中华文化的深层语法,又创生新的认同叙事。研究结论可凝练为三句话:谱牒是家族史,更是文化接口;叙事是记忆技术,也是认同政治;传统不是被保存的过去,而是被不断重启的资源。

### (一) 主要发现: 三重贡献

#### 1. 叙事特征层面

新加坡华人谱牒形成了“多语并置—数字重构—本土嵌入”的三位一体模式: 语言策略解决了跨代、跨文化阅读障碍; 数字技术把静态档案转化为可交互的公共记忆平台; 本土化将家族荣耀转译为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实现“离散—在地”双重身份的和解。

#### 2. 文化观念层面

“家国一体”与“祖先崇拜”通过直义/转义双重修辞, 成为压缩式价值存储器: 直义提供合法化宣言, 转义完成情感渗透; 民族祖先赋予文化正统性, 在地先贤提供现代典范; 二者并置使传统价值在移民语境中获得可迁移性。

#### 3. 理论层面

将叙事学“故事—话语—语境”模型与传播学“媒介化”视角整合, 提出“压缩—解压”机制: (1) 压缩: 谱牒在有限文本内高密度编码历史、价值与情感; (2) 解压: 通过仪式、数字交互与跨语际阅读, 家族成员持续再生产认同。该机制为理解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族群的文化存续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 (二) 研究展望: 三条进路

#### 1. 数字人文深挖

未来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与地理信息系统(GIS), 对谱牒文本进行大规模情感分析与空间可视化, 追踪“祖先—事件—地点”网络如何随时间演化, 并量化“家国话语”在不同世系中的权重差异。

#### 2. 跨文化比较

将新加坡与吉隆坡、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华人谱牒并置, 考察“家国叙事”与“多元文化政策”之间的互动模式, 检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 3. 政策与实践

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宗亲会合作, 开发“开放谱牒”平台, 引入众包校勘与故事上传功能, 使学术研究反哺社区教育, 强化年轻一代的文化归属。<sup>[17]</sup>

### (三) 方法论反思: 两种张力

#### 1. 文本与语境

侧重文本细读, 未来需补充田野访谈, 观察谱牒在清明祭祖、宗亲大会等仪式中的“活态”使用, 以弥合“书写叙事”与“实践叙事”之间的缝隙。

#### 2. 宏观与微观

家国叙事易于宏观阐释, 但家族内部的性别、阶层差异可能被遮蔽。后续研究应纳入女性、庶出、跨国婚姻等边缘叙事, 检视谱牒的排他性与包容性。

### (四) 最终命题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洪流中, 新加坡华人谱牒并未被冲淡, 反而通过叙事策略的更新, 成为连接“祖籍地—在地国—全球华人网络”的文化路由器。其经验提示我们: 传统若要长存, 就必须不断被翻译成当下的语言; 而每一次翻译, 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在阅读仪式中被持续激活, 最终使新加坡华人既“落地生根”又“不忘根本”。

**基金项目:** 论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华侨华人谱牒跨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19BXW075)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1] 张应龙, 林远辉.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3—6, 535—541, 548—551.
- [2] 林千. 新加坡华侨华人史话[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8: 273—324.
- [3] 彭刚. 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 历史研究, 2006 (03): 23—37.
- [4] [美] 海登·怀特. 新元史: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2—29.
- [5] 廖佩云. 诗性历史与理性历史: 当代史学理论中的两种取向[J]. 世界历史评论, 2020 (03): 137—151.
- [6] 陈涵平. 论《扶桑》的历史叙事[J]. 华文文学, 2003, (3): 66—69.
- [7] 杨庆祥. 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J]. 文艺研究, 2013, (8): 15—22.
- [8] 杨丁友. 论《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J]. 广西民族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0 (3): 137—141.
- [9] 张开焱. 文化与叙事[M].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4: 24—27.
- [10] 李炜. 大众文本与类型叙事[J]. 华中学术, 2011 (02): 152—161.
- [11] 高鸿.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D].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31—125.
- [12] 臧国仁, 蔡琰. 叙事传播: 故事/人文观点[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201—220.
- [13] Smith, A.M. Family Genealogy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Finding Common Ground[J]. Genealogy, 2017, 1 (1): 6.
- [14] 陈业雄, 李秉萱, 钟骏源.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新加坡华族谱系[M]. 新加坡: 新加坡族谱学会, 2014.
- [15] 柯群英. 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M].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3: 3—7, 36—38, 169—212, 215—218.
- [16] Khun Eng Kuah-Pearce.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9—249.
- [17] 王华. 东南亚华侨华人谱牒文献的形成、收藏现状与整理措施[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6(4): 103—107.

#### 作者简介:

邢永川 原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 2022年退休后受聘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林炫圻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23级学生。

【责任编辑: 刘君荣】